

doi:10.13582/j.cnki.1674-5884.2017.07.027

# 从宋代别集序看宋人诗文观念

谢敏玉

(佛山科学技术学院,广东佛山528000)

**摘要:**别集序的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,创作之宗旨,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。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序,解读、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,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:强调“文以气为重”;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;主张“诗出于性情”;主张“自然天成”的诗文风格等。

**关键词:**宋代;别集序;诗文观念

**中图分类号:**I206.2

**文献标志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674-5884(2017)07-0117-06

序体作为文体对象被阐释,早见于汉末刘熙《释名》。卷20《释典艺》:“叙,杼也。杼泄其实,宣见之也。”<sup>[1]317</sup>刘熙以声训的方式训“叙”,“杼”借作“抒”,意舒也,申也,“杼泄其实,宣见之”的意思就是将作品之实表达出来。刘熙关于序体的这一解释,常常为后世文体研究者直接引用。如刘知几《史通·序例》:“孔安国有云: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。”<sup>[2]87</sup>王应麟《辞学指南》:“序者,序典籍之所以作也。”<sup>[3]3841-3842</sup>曾国藩《经史百家杂钞·序例》:“序跋类。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。”<sup>[4]7</sup>别集序是别集刊行时所作序文,其功用在于揭示文集之内涵,作者创作之宗旨,时人或后人对该文集之评鉴。

别集序根据作序者不同,可分为他序文和自序文。笔者根据360册《全宋文》统计,宋代别集序约790余篇,其中他序文约占90%。他序文之作者,往往为当时名流,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为深邃的学识,在序文中,喜欢论文道,谈作文,或总结、评论文集作者的诗文观念,或借机阐释自己的见解。自序文则更接近文集主旨,序中关于诗文观念的讨论,往往是作者自身真切的领悟。通过研究有宋一代别集序,解读、归纳序作者关于诗文观念的阐释,大略可以理解宋人的诗文观念。

## 1 文以气为主

早在先秦时期,“气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存在于诸多典籍中。孟子将“气”的术语运用到精神领域里,《孟子·公孙丑》说:“善养吾浩然之气……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,以直养而无害,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,配义与道;无是,馁也。”<sup>[5]53</sup>这里说的“养气”,目的是提高人的道德内涵与性情修养。孟子的“养气说”,很大程度影响了后世的文气论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养气》认为生理血气、心理志气乃至作品文气之间是一脉相连的,而“气”可以后天培养训练,血气健旺、志气清明,自然文气顺畅。唐代韩愈《答李翊书》云:“气,水也;言,浮物也;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。气之与言犹是也,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”<sup>[6]</sup>韩愈把气与言的关系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,提出“气盛言宜”的观点。

至宋代,以“气”论文已成风气,论者多强调文章与人的气质、品格之间的关系。苏氏三父子的论述颇有代表性,苏洵《上欧阳内韩第一书》、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、苏辙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等文章均有见论。苏辙云:“其气充乎其中,而溢乎其貌,动乎其言,而见乎其文,而不自知也。”<sup>[7]186</sup>苏辙发挥了孟

收稿日期:20170619

基金项目: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项目(GD15XZW03)

作者简介:谢敏玉(1974-),女,广东佛山人,博士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。

子的“养气”说,认为“文者气之所形”,而“气”是可以靠修养获得的,并举孟子、司马迁为例加以说明。可见,苏辙所指的“气”,就是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修养综合而成的个性气质。

宋人序文中也多见关于文气的论述。《乖崖先生文集》乃张咏所撰,其弟曾哀辑其集。南宋嘉定时有郭森卿增编本,咸淳时伊赓重刻之。龚梦龙《重刊乖崖先生文集序》云:

文以贯道,气其主也。公劲气可沮金石,发为文章,岂必月露以为形,风云以为状,如经生学士,组织纤巧,而后为工?<sup>[8]17</sup>

龚序认为“文以贯道,气其主也”,盛赞张咏倘有大志、磊砢不凡、政绩铿錡,其人如此,则其劲气可沮金石,发为文章,“词简而理到,律严而事备,汪洋弘深,脱去翰墨畦町”,非经生学士,组织纤巧可比。

宋孝宗赵昚《苏轼文集序》云:

成一代之文章,必能立天下之大节。立天下之大节,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,未之能焉。<sup>[9]579</sup>

宋孝宗高度评价苏轼其人其文,并把苏轼推尊为“一代文章之宗”。宋孝宗认为,“成一代之文章,必能立天下之大节。立天下之大节,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,未之能焉”,“不然,虽雕虫篆刻,童子之事耳”。他把“气”“节”“道”紧密联系在一起:“养存之于身,谓之气,见之于事,谓之节。节也,气也,合而言之,道也。以是成文,刚而无馁,故能参天地之化,关盛衰之运”。

李纲《道乡邹公文集序》云:

文章以气为主,如山川之有烟云,草木之有英华,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,岂易致耶?士之养气刚大,塞乎天壤,忘利害而外生死,胸中超然,则发为文章,自其胸襟流出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<sup>[10]22</sup>

李纲认为,正是因为孟子、屈原具备“至大至刚”之气,“忘利害而外生死,胸中超然”,所以他们的作品,与那些雕章琢句的“小辨曲说”是不可“同年而语”的。他还进一步举例,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号称第一,“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”,是因其“操履坚正,以养气为本”。

周必大《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》云:

文章以学为车,以气为馭。车不攻,积中固败矣;气不盛,吾何以行之哉?<sup>[11]202</sup>

王元渤即王洋。王洋晚年寓居信州,有荷花水木之趣,因号王南池,亦自称王半僧或半僧寮。王洋为人耿介尚直。周必大赞其“仕可屈身不可屈,食可缓道不可缓”,称其诗文“以六经为美材,以子史为英华”,“挟之以刚大之气”。周序以车、馭比喻学、气在文章中所起的作用,以此说明,文无气,犹如车无馭一样寸步难行,一无可取。

陆游《方德亨诗集序》云:

诗岂易言哉,才得之天,而气者我之所自养。有才矣,气不足以御之,淫于富贵,移于贫贱,得不偿失,荣不盖愧,诗由此出,而欲追古人之逸驾,诘可得哉?<sup>[12]342-343</sup>

此乃陆游应朱熹之请为莆阳方德亨诗集作的序,序中,陆游认为“气”比“才”更重要,“气”属于德行的范畴,气不足以御才,则“淫于富贵,移于贫贱”。“气”有待于养,养气至沛盛不挠,创作自然出类拔萃,从创作主体的角度,强调“养气”对诗歌艺术的重要性。

魏了翁《攻愧楼宣猷公文集序》云:

盖辞根于气,气命于志,志立于学,气之厚薄、志之小大、学之粹驳,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。如声音之通政,如著蔡之受命,积中而形外,断断乎不可掩也。<sup>[13]75</sup>

此为魏了翁为楼鑰文集所作序。魏序称“即辞以知心”,从文章言辞之险易邪正,可以知道“气之厚薄,志之小大,学之粹驳”,即所谓“积中而形外”。他认为,楼鑰“肆笔脱口之余,公平坦易,明畅渊永”,是跟楼鑰所养之深厚之纯粹有关。

韩愈“立志养气”说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落实,宋人把“气”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“气”关乎作家的道德修养,是立言的根本。气刚气正气全,外发为文,自然能与日月争光。“气”在宋代主要表现为“理气”,是情理与艺术的统一,恰好与唐代的“情气”相区别而互为呼应。这种区别恰恰反映出唐宋文学精神的差异。宋人重视心性的涵养,唐诗的激情,在宋诗的理性面前被压制了。宋人以一

种冷静的、理性的态度来作诗,表现出冲淡平和、自然从容的境界。

## 2 养于内而发于外

宋人十分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,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。谢如圭《高峰先生文集序》云:

夫文以贯道为妙,道以正心为本。君子之学所养于心者醇正而无疵,则发而为文自然纯粹而不驳,可以贯道而无遗矣。<sup>[9]956</sup>

谢如圭强调先有内在积养的深博醇正,才有发而为文的自然纯粹。

孔武仲《南斋集稿序》云:

文章于学者之事末矣。昔之贤人有达而在上者,其言甚简,而录于《尚书》,皋陶是也;有穷而在下者,其言甚简,而录于《论语》,颜渊是也。彼其粹美积于中,辉光发于外,一言出,四海传之以为师法,遂以不朽于无穷,岂区区自异于文墨耶?<sup>[14]261</sup>

此序乃孔武仲自序。序中他认为文章对于学者来说是末事。能传诵四海不朽于无穷的文章,不是区区文墨就可以做到,而是要先有内在的积养,所谓“纯粹美积于中,辉光发于外”。

晁补之《石远叔集序》云:

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,而巧拙则存乎人,亦其所养有薄厚,故激扬沈抑,或侈或廉,絃纤不同,各有态度,常随其人性情刚柔、静躁、辩讷,虽甚爱悦,其致不能以相传。<sup>[15]108</sup>

晁补之提出先天的秉性不同,是形成其不同文学风格的最主要因素。后天的涵养修持,又足以弥补其先天不足之处。“所养有薄厚”,“养”的重要性,是晁补之很重要的文艺观念,他在其他文艺题材中,也持相同的看法,他认为文艺要精进,“养”是最重要的功夫,“养”的功夫,别无他法,全靠平日读书积累而得。

谢克家《后山居士集序》云:

孔子曰: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言之错综而奥美者为文,文之锻炼而幼眇者为诗,儒者以学成德,以德辅言,末之茂者本必深,委之广者源必远,盍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观之哉。<sup>[16]319</sup>

谢克家认为“儒者以学成德,以德辅言”,本深才能末茂,源远才能委广。楼炤《雪溪居士集序》有类似的观点:“君之文精深典赡,而诗迻丽逸发,其他众制烂然皆有体,则非涵养蓄蕴之厚,不能发之如此也。”<sup>[9]</sup>

李纲《古灵陈述古文集序》<sup>[10]25-26</sup>乃李纲应陈绍夫之请为其父陈襄文集所作序。序中,李纲赞颂陈襄是有德君子,“所为文章温厚深纯,根于义理”。李纲认为,道德仁义作为文章的根本出发点,所谓“有德者必有言”,“文以德为主,德以文为辅”。道德高尚的君子,其文“如星辰丽天,而光彩下烛”的,道德低下的小人,属文的目的是为了悦人之耳、朋奸饰伪,中害善良,那只会导致祸败。序中表面是说君子之文与小人作文的区别,实际上是要求为文必先修德。“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,而其余事发为文章,后世读者想望而不可及,此岂特其文之高哉?人足仰也!”

李纲《道乡邹公文集序》<sup>[10]22</sup>亦持有类似的观点,序云:邹公直道危言,不容于朝,而气不为之稍挫,遇赦得归,奉亲友弟,其品德如此,故文章“高明闳远,温厚深淳,追古作者,有黼黻之文,有金石之声,有菽粟布帛之用”,强调了“有德者必有言”这一观点。

## 3 诗出于性情

关于“诗者情性”一说,古而有之。《毛诗序》云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吟咏情性以风其上。”“吟咏情性”的说法,正式把情性从“志”的范畴中分离出来。陆机《文赋》云:“诗缘情而绮靡。”提出了“诗缘情”而没再提“止乎礼义”,明确地揭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处处紧扣“情”字,主张“情者文之经”,“以情为本、文辞尽情”,“因情立体,即体成

势”，“为情而造文”，把“情”提升到本体地位。钟嵘《诗品序》云：“夫属词比事，乃为通谈。若乃经国文符，应资博古；撰德驳奏，宜穷往烈。至于吟咏情性，亦何贵于用事？”钟嵘认为诗与经国文符等应用文体不同，是以情动人，不非以理服人，诗应当“吟咏情性”。唐以后诗人和诗论家，更加肯定诗歌中情感占据的重要地位，诸如白居易提出“诗者，根情、苗言、华声、实义”，皎然提出“诗缘情境发”等观念，高扬了诗歌的情感特征。

诗学中的“情性说”源远流长，而宋人对此既有所继承，又有不同的阐发。《毛诗序》所指“情性”是社会群体的，钟嵘所指“情性”是一般个体的，而宋人所理解的“情性”已基本上特指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情趣，有着独特的内涵和自己的特色。

欧阳修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云：

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，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。外见虫鱼、草木、风云、鸟兽之状类，往往探其奇怪。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，以道羁臣、寡妇之所叹，而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。<sup>[17]52</sup>

此序乃为梅尧臣诗集所作，通过对梅尧臣坎坷仕途的叙写，提出了诗歌“殆穷者而后工”这一著名美学观点。序中认为，诗人“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”，才能写出好诗，诗篇正是性情郁积的抒发。这个见解，与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“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，是一脉相承的。欧阳修又有《薛简肃公文集序》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：“至于失志之人，穷居隐约，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，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，皆一寓于文辞。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。”<sup>[17]66</sup>

宋祁《西州猿稿系题》云：“诗者，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。所以怡性情，娱僚宾，故狭章不为贫，积韵不为广，悼于往弗及于流。”<sup>[18]326</sup>序云“诗者，探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”，与薛田《钜鹿东观集序》云“夫诗之作，不与文偕，大率情根于意，言发乎情，默而化之，流为章句”<sup>[19]410</sup>，观点相类，都认为诗歌都是性情的自然流露。

邵雍《伊川击壤集序》云：

子夏谓《诗》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……其或经道之余，因闲观时，因静照物，因时起志，因物寓言，因志发咏，因言成诗，因咏成声，因诗成音。是故哀而未尝伤，乐而未尝淫。虽曰吟咏情性，曾何累于性情哉！<sup>[20]33-34</sup>

此篇乃邵雍自序。邵雍在序中明确倡导“以性观性，以心观心，以身观身，以物观物”，又云“故哀而未尝伤，乐而未尝淫”，提出了如何衡量所吟咏之性情的标准问题。理学家以理节情，始终保持平和克制的心态，这样，诗歌“虽曰吟咏情性，曾何累于性情哉”，诗歌由抒写不平之愤、哀怨之情转变为吟咏得道之乐，起到了涵养心性的作用。

黄裳《言意文集序》云：

道本于心，以性为体，以情为用。志者存乎心而行者也，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，言者发于心而应者也。著述之士，虽累千百万言，反本而求之，则贯乎一而已。<sup>[21]77</sup>

此篇为黄裳自序。黄裳认为，有道之文源于心性，是意的表现。“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”，“有感而后动，合养而为意”，强调有感而后作，不为艰苦轻扬之辞。黄裳《乐府诗集序》《章安诗集序》等自序中，亦有相关论述。

黄庭坚《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》云：“诗者人之性情也，非强谏争于廷，怨忿诟于道，怒邻骂坐之为也。”<sup>[22]188</sup>黄庭坚认为诗是情性之物，而性情须超脱凡俗、温柔敦厚，“仕不遇而不怒，人不知而独乐”，即使怀才不遇也应处之泰然、安之若素。他反对在诗中发泄情绪，反对“强谏争于庭，怨忿诟于道，怒邻骂坐”这样激烈的表达方式。他也不赞成诗人执著地干预朝政，认为“发为讪谤侵陵，引颈以承戈，披襟而受矢”，都不是诗歌抒写性情的主旨。

宋人把人的情性看作诗歌的本质和创作动因，作诗应天理自感，非刻意为之，反对虚伪矫情，提倡自然真诚的创作态度。强调诗歌的产生，是诗人内在素质的自然流露，而非简单的、外在的词语堆砌和文字游戏。“无意于诗，自然浑成”，是宋人追求的诗境界。然而宋人所指“情性”偏取温柔敦厚一路，否

定谏争与泄愤,宋人的诗学思想与人格追求是紧密联系的。

#### 4 “自然天成”说

所谓“自然天成”,是强调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,反对雕琢经营和务奇求深,讲求诗文创作的天然天成。对此,宋人多有论述。如宋初田锡《贻宋小著书》云:

若使援毫之际,属思之时,以情合于性,以性合于道,如天地生于道也,万物生于天地也。随其运用而得性,任其方圆而寓理,亦犹微风动水,了无定文;太虚浮云,莫有常态,则文章之有声气也,不亦宜哉?<sup>[23]218</sup>

田锡认为自然界自有其规律,为文亦如此。自然世界不拘常态,文章的写作亦不必拘于一格,而应该出于天然,随其运用而得性,任其方圆而寓理。

苏洵亦认为:风行于水上涣,天下之至文也。其《仲兄字文甫说》云:

然而此二物者,岂有求乎文哉?无意乎相求,不期而相遭,而文生焉。是其为文也,非水之文也,非风之文也,二物者非能为文,而不能不为文也,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。故曰,此天下之至文也。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,而不得以为文;刻镂组绣,非不文矣,而不可与论乎自然。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,唯水与风而已。<sup>[24]162</sup>

苏洵反对绮靡浮华、堆砌词藻的文风,认为“刻镂组绣,非不文矣,而不可论乎自然”。他以“自然”为美,风行于水,自然成文,皆不待有意的经营,依于宇宙的自然之道,便能体现自然之美,就成了“天下之至文”。苏洵的这种“自然主义”的观念,对苏轼的影响是直接的。苏轼在《南行前集叙》中说:

夫昔之为文者,非能之为工,乃不能不之为工也。山川之有云雾,草木之有华实,充满勃郁,而见于外,夫虽欲无有,其可得耶!自少闻家君之论文,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。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,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。<sup>[25]189</sup>

所谓“充满勃郁”云者,指一种兴会淋漓不可遏制的状态,为文“不能不之为工”“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”等,都说明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应当是合于自然的。苏轼《自评文》云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而出。在平地滔滔汨汨,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,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。”<sup>[25]221</sup>苏轼《与谢民师推官书》云:“大略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。”<sup>[26]336</sup>苏轼对人对己都把行云流水般的自然风格视为诗文的最高艺术境界。

张耒《贺方回乐府序》云:

文章之于人,有满心而发,肆口而成,不待思虑而工,不待雕琢而丽者,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。世之言雄暴虓者,莫如刘季、项籍。此两人者,岂有儿女之情哉?至其过故乡而感慨,别美人而涕泣,情发于言,流为歌词,含思凄婉,闻者动心焉。此两人者,岂其费心而得之哉?直寄其意耳。<sup>[27]299</sup>

此序乃张耒为贺铸词集所作。张耒认为,文章“满心而发,肆口而成,不待思虑而工,不待雕琢而丽”,这与苏氏的自然天成说一脉相承。张耒反对雕琢文辞,力主顺应天理之自然,直抒胸臆。

汪藻《鲍吏部集序》云:

古之作者,无意于文也,理至而文则随之,如印印泥,如风行水上,纵横错综,灿然而成者,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?六经之书,皆是物也。<sup>[28]229</sup>

“无意于文也,理至而文则随之”,“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?”都是强调诗文创作之“自然天成”。汪序可见苏氏父子“风行水上,自然成文”说的影响。

宋人的“自然天成”说,倡导一种自然朴素之美,追求以自然为美的人格理想和以自然为美的艺术情趣高度统一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中说:“谢所以不及陶者,康乐之诗精工,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。”<sup>[29]696</sup>在宋代文论家看来,精工远不及自然。他们反对雕饰,反对刻意的为文造情。诗文的创作,应该是“纯粹美积于中,辉光发于外”,应该是“有所不能自己而作”,应该无意为诗,出于性情,自然天成。

**参考文献:**

- [1] 刘熙(著),王先谦(撰集).释名疏证补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.
- [2] 浦起龙.史通通释·序例[M].上海:上海书店,1988.
- [3] 王应麟.玉海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;上海:上海书店影印本,1987.
- [4] 曾国藩.经史百家杂钞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7.
- [5] 孟轲.孟子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.
- [6] 韩愈.韩昌黎文集(卷三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- [7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九五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8] 祝尚书.宋集序跋汇编(第一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9] 祝尚书.宋集序跋汇编(第二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10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七二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1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二三〇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2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二二二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3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三一〇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4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〇〇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5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二六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6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四五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7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三四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8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二四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19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八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0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四六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1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〇三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2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〇六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3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五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4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四三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5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八九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6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八七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7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二七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8] 曾枣庄,刘琳.全宋文(第一五七册)[M].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.
- [29] 何文焕.历代文话(下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
(责任校对 谢宜辰)